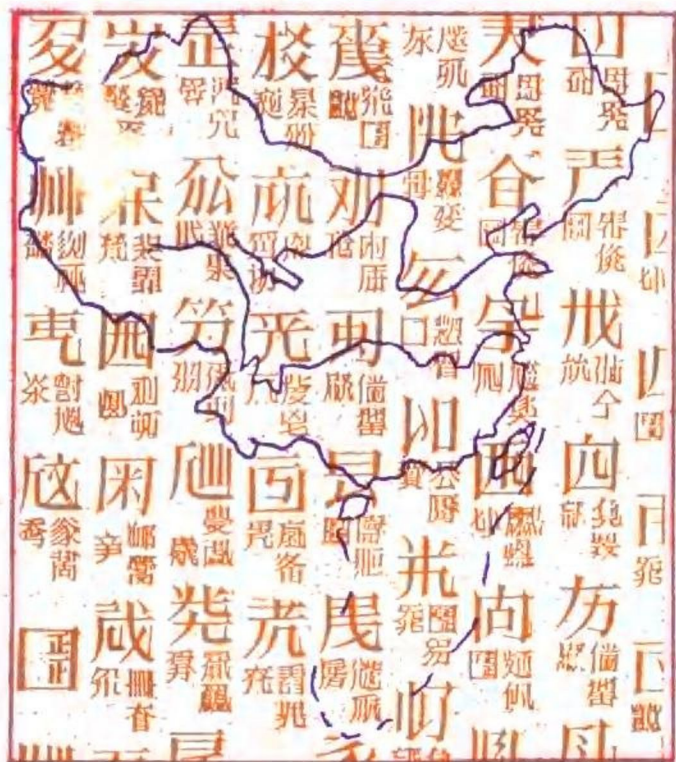


中國地名文化

牛汝辰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国地名文化

牛汝辰 著

中国华侨出版社

(京)新登字 190 号

中国地名文化

牛汝辰 著

出版者 中国华侨出版社
北京市朝内大街 130 号
(邮政编码:100010)

经销者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

印刷者 北京师范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 本 787×1092 毫米 32 开本

字 数 150 千字 7.75 印张

版 次 199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1993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300 册

80074—584—8/G·157

内 容 提 要

地名，是人类历史的化石。地名，是民族文化的镜象。本书是一部从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与地名；宗教信仰与地名；避讳年号与地名；姓氏与地名；民族迁徙与地名；社会经济与地名；民族习尚与地名；民族分布与地名等方面来探究地名与中国文化的关系的学术专著。读者可以从中了解到许多地名文化的知识，是一本从地名追踪中国文化的难得的佳作。

序 言

曾世英

地名是历史的产物、地理的反映，是一种文化现象。我国有悠久的历史，辽阔的领土，多种多样的语言文字，因而形成了一个数量庞大、内涵丰富的地名宝库。这是一份难得的民族文化遗产。地名研究不仅可以大大丰富读者的地名知识，而且它和爱国主义教育存在着密切的关系。

地名不仅在行政设施、新闻报道、交通管理和军事行动上与人人接触且天天使用，更由于我国语种复杂，如果处理不当会影响民族之间的团结，甚至会违反“名从主人”的原则，牵涉领土主权和国家尊严。故举数例以示地名工作具有深远的现实作用和科学意义。

中尼界山珠穆朗玛峰这一地名是藏语女神称号的音译。远在清康熙五十四年（公元1717年）它已见于《皇舆全览图》，作朱母郎马阿林，其中专名部分同音，通名部分则在满语中意为山，藏族居民必然称说较早。据印度测量局记载，印工作人员在室内计算测量记录时发现此峰高程突出，从坐位跳跃起来。乃于1858年以该局局

长的姓氏命名为 Mount Everest。当初欧洲大陆的地理学者因知我国早有称说，不予同意，后经英国皇家地理学会广为宣传，乃在国际上产生了影响，我国长期盲从译作“额菲尔士峰”或“埃佛勒斯峰”，那是有损国家尊严的。新中国建立后，经北京大学林超教授详查了多种文献，才得到了正名。

《汉书·地理志》有龟兹县，颜师古注：龟兹人来降附者处之于此县，故以名云。《新辑注地理志》指为陕西米脂县，可见有一部分龟兹人移居内地了。但也有由于地名问题没有得到解决，而使某一民族的迁徙路线悬而未决的。据说裕固族有一民歌：“唱着说着才知道了，我们是从西至哈至来的人，西至哈至迷失了方向来的……”。其中的地名“西至哈至”不见于史籍，这样的地名仍为学者研究裕固族迁徙的课题。

地名不仅记录地物的方位，而且记录地理的变迁。我国古代在地名的命名上就有山北为阴、山南为阳，水北为阳、水南为阴之说。例如华阴在华山之北，衡阳在衡山之南；洛阳在洛水之北，江阴在长江之南。但现在汉阳在汉水之南，岂非违反了这一说法呢？其实不然，这是由于汉水下游改道所致。又如 1855 年黄河改道以前，利津附近有铁门关，在海滨。现在三角洲的前缘已伸出几乎达一百公里，虽然近年详测的地图上已不见这一关隘的标志，但新旧地图对比，可由地名推算冲积的速度，成为科学考证的依据。

地名的研究历来受到中外学者的重视。它涉及语言、地理、历史，以及社会、民族等学科。而在旧时代许多

学科的学者尚少协同工作的条件。上世纪中叶，西方国家由于地理学的发展和测绘学的兴起，地图上出现了大量的地名，不仅语种多样，而且地名中保存着古语、古音，语言学家乃据以研究语言的演变；再则，地名有今昔的异同，历史学家又据以考证疆域的沿革。新中国成立后展开了全国详图的测绘，地名在地图上是要素之一，地图测绘工作者必须重视地名的调查研究，为此地名的研究作为一门学科，在国内也提上了议事日程。

牛汝辰同志近年潜心研究地名，他写的这本《中国地名文化》小册子，不仅深入浅出地勾画了我国地名文化的概况，而且作为一本具有趣味性的通俗读物，通过地名启示祖国锦绣河山的可爱，这是值得欢迎的。笔者在此对牛汝辰同志表示祝贺，同时对他还有一点期望，这就是在我国多民族、多语种的社会主义大家庭里，不仅对汉语的地名和用方块汉字译写的各语种的地名要进行研究，而且应当从兄弟民族的原语原文进行深入研究。牛汝辰同志熟通维吾尔语，希望他不仅对维吾尔语的地名着重研究，还要进而对同一突厥语族的其他语言以及其他兄弟民族语言的地名进行研究，以在我国的地名研究工作上做出更大贡献。

1990年6月1日

目 录

序 言	曾世英 (1)
地名与文化 (绪论)	(1)
一、地名理论研究	(8)
(一) 地名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其意义	(8)
(二) 地名研究的特殊方法及其发展趋势	(19)
(三) 地名研究与语言学	(26)
(四) 语言地理学与地名学	(31)
(五) 双语区地名研究与语言学	(37)
(六) 地名标准化与宽容度	(41)
(七) 从中国地图史看历代地名研究	(53)
(八) 中国古代地名学史略	(68)
(九) 国外地名学研究回顾	(74)
二、地名文化透视	(90)
(一) 地名与图腾崇拜	(90)
(二) 地名与宗教信仰	(99)
(三) 地名与姓氏渊源	(106)
(四) 地名与避讳、年号	(115)

(五) 地名与民族迁徙	(124)
(六) 地名连名制与氏族社会	(131)
(七) 从地名看我国民族分布	(137)
(八) 从地名看我国古代井田制	(148)
(九) 从地名看奴隶制遗痕	(152)
(十) 从地名看栽培稻的起源和传布	(156)
(十一) 从地名看井盐开采史	(160)
(十二) 从地名看农业开垦	(164)
(十三) 地名与商业手工业	(169)
(十四) 地名与十二生肖	(172)
(十五) 地名与植被变化	(177)
(十六) 地名与水文变迁	(181)
(十七) 从方言地名看地方文化	(185)
(十八) 地名与铜鼓	(193)
(十九) 地名与岩画	(196)
三、北京、台湾、新疆、海南岛地名说略.....	(199)
(一) 从北京城区的地名看城市地名的命名 ..	(199)
(二) 北京的胡同名及其更迭	(205)
(三) 台湾地名的文化特色	(209)
(四) 新疆地名的形成	(212)
(五) “疏勒”名称考订.....	(222)
(六) “喀拉”地名解析.....	(226)
(七) 海南“临高人”的源流	(232)
后 记.....	(236)

地名与文化（绪论）

地名是文化的镜象。地名学的研究犹如一座蕴藏丰富的综合性矿山，可供开采挖掘的财富众多。从文化学的角度来审视，可以发现这里面有许多内容都与我们民族文化息息相关。如地名与文化的关系就包括地名与社会文化心理、地名与社会生活、地名与宗教信仰、图腾崇拜、民族迁徙、地名对文化的反作用等等。因而有必要以新的理论背景、新的切入视角对地名学做一较为全面、系统、深入的研究。我们认为，地名现象千差万别，纷纭复杂，但归根到底，它是人类文化之一。人类生存的环境和地域为何要有名字，地名如何发展演变，地名的形式结构，地名的内隐含义等等，都是由文化这个总根派生出来的，都可以从文化学的角度加以解释和验证。就连地名的物质材料——语言文字，也是文化在表层的投射反映，是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正如英国著名的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所指出的那样：“一切对于人类活动、人类集团及人类思维和信仰的个别专门研究，必会和文化的比较研究相衔接，而且

得到相互的助益。”^①

—

文化是一个复杂的概念。当今比较有倾向的看法是将文化限定于精神领域。其内容大致包括：语言、信仰、命题、规约、公众价值观、行事方法、常规、风俗、还有宗教、哲学、艺术、社会心理等。它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②。文化可以体现为不同的形态。美国人类学家克鲁克洪指出，它“既包括显性式样又包括隐性式样。”这个观点给我们的地名与文化的研究以很大的启示。作为人类文化的一个组成部分，地名实际上是显性式样和隐性式样的综合体。地名的物质材料——语言文字形式及地名的结构模式等，均属于地名的显性形态；而地名的形式和结构背后所反映的信仰、习俗、道德观、价值观、文化心理、美学观念等等，则是其隐性内涵。显性形态是隐性内涵的外化，受隐性内涵的种种影响和规约；通过显性形态的描写、分析，可以比较准确地把握隐藏在其背后的种种观念，从而揭示出地名的种种深刻内涵。

根据系统论的观点，我们可以把复杂的地名现象看作一个系统。这个系统内部包括专名、通名、地名词缀、简

① 马林诺夫斯基著《文化论》费孝通等译，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7年。转引自王建华《文化的镜象——人名》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年。
② 克鲁克洪等《文化与个人》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

称、雅称、俗称、全称、旧称等因子，它们构成了地名系统内部的关系网络；这个系统外部则同文化、历史、社会、地理、生活等因子有着广泛而深刻的联系，构成了地名系统外部的种种关系网络。前者的关系网络表现为地名文化的显性的、表层的形态，后者则积淀成地名文化的隐性的、深层的内涵。把地名的表层形态和深层内涵之间的对应关系揭示出来，正是地名学研究的主要目的。

地名，首先是一种语言现象。作为专名学中的地名，与一般的语言现象相比，有其自身特点。第一，特指性。每一个地名都与具体的所指对象相联系，都是某个地域或地点的特定标志。如深圳，特指广东省南部与香港相邻的我国经济特区。第二，符号性。用于地名的语言材料与普通词汇不同，它们大都失去了其在语库中原有的含义，主要作为一种指别的符号。如“上海”并不是“上面的海”，“天山”也不是“天上的山”的意思。

除了特指性和符号性的特点之外，地名还具有变异性的特点。这种变异性主要体现在功能上。地名的功能是指别，一个地名特指一个具体的地域。但是在现实生活中，地名的这种特性也会发生程度不同的偏离，产生变异现象。这就是所谓的“功能变异”。^①由于人们命名中某种共同心理的影响，地名常可能发生同名，这样，地名的特指性就要

打折扣了。例如在中国叫“城关镇”的有几百个，同时大约每个县（市）内有20%—40%的村庄名称使用姓氏。一些大姓村庄的重名现象尤为严重，如浙江省嵊县面积1828

① 何小平、林文彪《试论地名的重名现象》，载《绍兴师专学报》1989年第3期。

平方公里，有自然村 2276 个，其中同名的村庄 306 个，多为姓氏名称的村庄重名，如王家村、张家村、黄家村等。

地名除了功能上有变异性之外，其形式也存在着变异性。如在语音上，由于历时的原因，地名中许多字有其特定的读法。如“百色”读 bó sè，“龟兹”读 qiū zī，“六安”读 lù ān，“乐亭”读 lào tìng。有时甚至地名的基本结构也可能发生变异。如汉语地名为“专名+通名”结构，而我国壮侗和藏缅等语族的地名则为“通名+专名”结构，如西藏的“错龙（湖）”、“错那（湖）”，“错”意为“湖”。由于受汉语的影响，现在的壮侗和藏缅语族的地名大多都变成了“专名+通名”结构。如“扎日南木错”、“纳木错”等。

地名系统内部的种种变异大都与系统外部因素有关。形式的变异反映了历史文化的变迁，结构上的变异则反映了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等等。如果说，地名的特指性、符号性特点使之作为一种语言现象，那么，地名的种种变异现象，则作为地名与文化密切联系的一个切面。它一方面使地名系统的表层形态复杂丰富，另一方面则同深层的文化内涵紧紧焊接在一起，从这个意义上说，地名不仅仅是一种语言现象，本质上它还是一种文化现象。

二

地名与文化共生。它是人类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是人类文化发展的必然结果，是人类文化的标志之一和首批果实。地名的历史同语言本身一样古老。地名从它产生的

那一天起，便作为人类文化一个密不可分的组成部分。

地名与文化共变。人类文化从古到今已有近百万年的历史，文化也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由单一到丰富的发展过程。地名在这个过程中是与文化同步发展的。例如图腾产生之前，原始人群过着游徙生活，既没有群体名称，也没有地名。图腾产生之后，每一个群体都以某种动物或植物作为自己的图腾，并以它作为自己的名称。由于每一个群体、每一个氏族都有自己的图腾名称，所以，当他们定居于某一个地方后，人们往往以其群体或氏族的名称作为该地的名称。因此，最早的地名大多是图腾名称。李玄伯曾说：“……最初只有图腾之分，而无地域之别。所谓先有英吉利人而后有英格兰，英格兰名字，得自英吉利人。”他认为：“我国最古的地名，大部是图腾的名字。用这种图腾（姓）的团（氏族），因定居在某一地，就用图腾以名其地。”据他考证：虞地得名因驺虞（仁兽）氏族定居，扈地得名因扈鸟氏族定居，燕地得名因玄鸟氏族定居。^①彝族曾以虎为图腾，主要表现在本民族的自称与虎的名称相同。云南哀牢山有彝村名“罗摩”（母虎），所居山岗名有“纳罗”（黑虎）。凉山州北邻峨眉山为彝族故居，彝称“罗目（即罗摩）山”，即母虎山。^②“峨眉”一名也许就源自罗摩。

地名是文化的镜象。文化渗透在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对各种社会现象和人们的各种行为都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地名是人们的社会行为产生的结果，与社会心理、社

① 李玄伯《中国古代社会新探》开明书店 1949 年。

② 牛汝辰《地名与中华民族的图腾崇拜》，载《社会科学战线》1988 年第 3 期。

会生活、风俗习惯等因素都有关系。透过地名的种种镜象，可以观照到文化在社会心理、社会生活、风俗习惯等方面的投影。在地名中有许多避讳的实例，如鲁隐公名“息姑”，当时鲁国史官避讳，便将地名“姑蔑”省称为“蔑”。鲁哀公的父亲鲁定公名“宋”，避讳“宋”字。所以在鲁哀公同岍夏对话过程中，岍夏避讳“宋”字，将“宋”称之为“商”。汉高祖刘邦，避讳“邦”字。汉代人凡“邦”都称国。

地名是文化的载体。地名和其他语言现象一样，在文化的发展过程中，充当了运载、传播的工具和角色。由于年代的久远、岁月的淘洗，上古许许多多的文化内容已湮不可考，但正是在地名中，还保留着不少上古文化的痕迹。如在今云南省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元阳县南部的黄草岭、俄扎乡一带的哈尼族腊咪支系，至今尚保存着较为完整的“地名连名制”^①。从地名连名可以看出一母寨分出若干子寨，这些子寨又繁衍出新的子寨，子寨名称都带有母寨名称的一个字。如“堕铁”→“多沙”（即堕铁沙）→“多普”（即多沙普）→“多洛”（即多普洛）→“多脚”（即多洛脚）。地名连名制的产生是与氏族制度密不可分的。在氏族制度下，每一氏族在发展中分为若干女儿氏族，这些女儿氏族与母亲氏族组成胞族；若干胞族组成部落；若干部落又组成部落联盟。一方面氏族分裂出女儿氏族；另一方面，原有的村寨也分裂出女儿村寨。这些分裂出来的氏族，其内在的联系必定是血缘的联系，而外在的联系及

① 牛汝辰《中国民族语地名的多元文化背景》，载《贵州民族研究》1990年第4期。

其形式则是地名。地名连名制的出现应早于父子连名制，因为前者产生于氏族分离和村寨分裂之时，而后者产生于父系家庭建立之后。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地名连名制曾给予父子连名制以启示。

一、地名理论研究

(一) 地名学的研究对象、任务及其意义

地名学是研究地名的由来、演变、语词构成、分布规律和功能的一门科学。

地名学的研究对象就是地名。这里的地名可以是个体地名、某一区域的地名，也可以是某一类地名，还可以是历时的地名和共时的地名等等。地名学的研究对象还包括和地名相关的语言、历史、民族、民俗、地理、宗教乃至文化的研究。

地名学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大量个体地名的产生、语词特征、名实关系、地名演变情况进行深入研究的基础上阐明地名的起源、演变和分布的普遍规律，并运用这些规律来指导地名的社会实践。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当前主要有以下具体任务：

1. 地名分布规律的研究。包括不同语词在地域分布上的规律，如带有“碌（六）”字的地名多出现在广西地区，带有“弄”字的地名多出现在江苏、上海地区，带有“河”字的地名多出现在北方，而南方地名中多为“江”字。